

# “9·11 综合症”与新的国际安全态势

王 逸 舟

**【内容提要】**本文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前因后果作了一个初步但比较全面的分析,对所谓“9·11 综合症”从以下十个方面进行了剖析:1. 美国强大和安全之神话的破灭;2. 美国安全日程的变化;3. 美国新的战略态势;4. 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的提速;5. 美国实施报复行动面临的难题;6. “9·11 事件”可能带来的反思;7. 对美国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8. 各国的利益与盘算;9. 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的分水岭;10. 中国怎么办,中国学者怎么办。

**【关键词】**9·11 综合症;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国际安全与国际战略

**【作者简介】**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9550(2001)11- 0004- 06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复杂和微妙的动向。在确定中国的外交应对和防范政策之前,我们必须对“9·11 事件”的综合症予以全面认真的评估。笔者在此提出几点看法,供读者和同行批评讨论。

—

美国此番遭袭及其严重人员财产损失,在世界面前充分暴露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某些盲点和脆弱之处,有力地摧毁了有关美国的一些神话与光环。举一个例子。以往美国人常说(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人也有类似的看法):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和最发达的信息情报网络。也就是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什么敌人能够与美国抗衡。更多的美国人真诚地相信,20 世纪的美国,不仅提供了其他国家效法的模式,也提供了当代人类发展的希望。他们不仅把 20 世纪说成是“美国世纪”,而且对 21 世纪作出了同样的预见。对于多数美国政治家、战略家、普通百姓甚至运动员来讲,美国人

高居世界之上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甚至无法容忍世界第二的位置。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让美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了这类观念。震惊世界的“9·11 事件”,首先是对这些广泛传播而根深蒂固的认知的沉重一击,给美国人当头棒喝。国际恐怖主义对五角大楼和纽约世贸大厦的可怕而成功的进犯,对美国安全总部和美国文化象征的无情而有力的毁坏,不仅将在很长时间内潜移默化地侵蚀美国人的自大心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他国家的民众对于美国的看法。这方面,我们不妨简单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的教训是,美国不是“安全岛”,美国的安全不可能在其他地区处于麻烦和战乱的情形下孤立地存在,美国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把自己与世界整体的安定联系在一起。罗斯福总统在决定参战前夕给美国人的这个提醒,是来自珍珠港事件血的教训。发生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的侵越战争,也曾经给美国人民以长久而痛苦的提示。它告诉他们,美国不是无往不胜的,即便对手是越南这样的弱小国家,如果前者与后者相比在道义上输理的话。被称做“越南综合症”的现象,左右了其近二十年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可惜 90

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使这种令人谦虚的反省过程中断。美国再度趾高气扬,以一种“放眼天下无敌手”的姿态,对待他人和自我定位。“9·11事件”再次提醒美国人,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甚至算不上比较安全的国家。

## 二

“9·11事件”的最大启示在于,它无比有力地凸显了布什新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广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荒谬性,对美国内力主发展此系统的鹰派势力是一次强力阻击。试想,某个或某几个非政府的恐怖集团仅仅凭借精巧的策划,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和再低廉不过的成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短短时间内造成美国上万人的伤亡和数十亿美元的财产破坏(这里且不提间接的和潜在的损失)。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军方和强力机器花费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研制的导弹防御系统到底有什么用?每年花费美国纳税人大量税款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以及遍布全球的美国“天梯”监听系统出了什么毛病?美国战略家所推崇的“零伤亡”理论及其战略战术设置难道不像一个天大的笑话?此次国际恐怖行动的效能(“所谓价格性能比”),难道不让NMD、TMD等吹嘘得让人眼晕的高科技军事体系相形见绌吗?如果美国的强力机器让纽约的平民百姓和自己的军事总部都无法得到起码的安全保障,又有什么必要到外太空搞花钱如流水、听上去像梦幻似的防御系统?假使穷乡僻壤的几个恐怖主义集团就能在美国人眼皮底下发动有效攻击,那些潜在的挑战国家和麻烦制造者真要和美国过不去,何必使用一些需要在空中飞行个把钟头的洲际导弹,或者调动其他一些被卫星等监视手段轻而易举发现的攻击系统?类似的批评理由,人们可以几十条、几百条地列举出来,证明美国所谓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逻辑之荒谬。当然,现在我们尚不能确定这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会在多大程度改变美国战略家的思维定式,延缓美国推进全球导弹防御计划的进程,但毫无疑问,影响是存在的,可能是长期的和深刻的。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设计是美国称霸新世纪、占据制高点的一个长远规划,不会简单因为一两件突发事件而放弃,不过,至少从眼下情况综合判断,至少在未来一段时期,布什政府会受困于与恐怖主义的艰难斗争,不可能像前一段那样咄咄逼人地全力推进反导计划。这不只是为了避免遭受本

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批评,而且确实确实是由于美国国家安全议事日程上的轻重缓急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三

为了缓解国内批评和压力,也为了从根本上遏制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今后一段时间内,估计至少两三年时间,美国执政者和强力机器不得不集中全副精力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它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欧亚大陆有关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从前苏联脱离出来的中亚各国)对美国反恐行动的认可及协助,它可能同样需要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支持,特别是安理会的积极配合。加上美国国内气氛的改变,以及赫尔姆斯参议员等极端保守势力的退隐式微,因此,有一种比较乐观但不无道理的估计是,美国当局有可能缓和前一段对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咄咄逼人态势,降低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调门,在北约东扩和推动“亚洲版北约”等方面放慢步伐,多少改变对待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傲慢态度(包括譬如说缴纳拖欠的大量会费和支持联合国框架内的某些多边条约)。这将使主要大国之间前一阶段围绕反导系统问题出现的战略紧张关系暂时趋于缓和,使国际关系出现一段时期的特殊合作氛围。对许多国家来讲,果真如此,那无疑是坏事变好事,值得欢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善良的愿望行事,尤其不能一味按照正面预测确定自己的政策走向。谁能预料美国是否会在此次事件后真地收敛一些?美国人的“韬光养晦”的时间有多长?当今世界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会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特殊的合作气氛过去之后,美国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和策略表现它的难于释怀的“霸主情结”?美国人战术的退却与战略的进攻之间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看看美国一些人和传媒此时此刻的对“9·11事件”的“总结”吧:他们强调的重点,不是我们以上讨论过的教训,如同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提示的那样,相反,是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是某种以暴制暴的吓人词汇。比如,世人被告之,此次对美国的袭击是“对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的践踏”,美国将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以十倍、百倍的报复“还以颜色”,甚至考虑动用核武器,取消原先的暗杀禁令,扩大对本国公民和对外的窃听范围,等等。我认为,这种霸气心态及威胁语言不仅于事无补,很可能它也遂了某些恐怖主义分子的愿,那就

是大家“破罐子破摔”，让世界面临末日。像很多人一样，我的真诚期待是，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不会被任何极端的心态（不管来自哪一个方向）所左右，任何时候美国战略家们在制订行动计划时，不要像恐怖分子那样失去人的理性和忘记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

#### 四

短时期内，美国将对国际恐怖主义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它很可能是有史以来国际社会所见过的最严厉的报复行动。世界各国将见证这次新的严酷战争，一次全新的、反映全球性危机及其处理特点的反恐怖战争。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预测的那样，这次打击行动将是系统全面的、无比严密的和冷酷无情的。不仅某些国际恐怖势力的基地及组织将被彻底摧毁，很可能对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支持庇护的国家也要波及。从各方面因素分析，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主要有：使用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对阿富汗等国的国际恐怖主义基地实施大规模的轰炸，对庇护或同情这些组织的国家的各种设施彻底破坏，有意摧垮它们的民用经济基础；动用地面部队，比较可能是特种部队，直接出兵受惩罚对象所在的国家 and 地区，穷追猛打国际恐怖组织的关键人物及其周围势力；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长期的经济封锁，查封其国际账户和海外可用资源，从而彻底断绝国际恐怖主义的经济财政基础；设法说服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支持美国的惩罚性战争和相关的制裁措施，形成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而持续的压力；在无法获得安理会授权和联合国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一如在科索沃危机时那样，美国单独行动，并依靠它在北约的盟友，利用西方整体优势的军事机器，对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恐怖主义集团）实施军事打击；使用暗杀、突袭、散布谣言、制造恐慌、舆论宣传、资助扶持反对派、分裂不同派别等手段，瓦解庇护反美恐怖主义的国家政权；利用各种利诱手段和压力，在所谓“麻烦国家”或“恐怖主义基地”的周边国家（很可能是中亚地区的某个国家），建立起美军基地或者军火库，长期保持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慑。可以肯定，国际恐怖主义在遭受此番持续、严密、冷酷的打击之后，会损失惨重和元气大伤，但它们不可能被根除，更不会销声匿迹，仇恨的种子和土壤依旧存在。面对美国的残酷报复和长期压迫，不能排除对立各方冤冤相报、以暴制暴之恶性循环出现的可

能，谁也无法精确预测随后的冲突形势会是什么样式、何种程度。美国布什总统喜欢把它称为“新世纪的头一场战争”。这是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不择手段埋下伏笔？还是真把它视为一场全新的作战方式？人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如同法国外长指出的那样，假使美国的不恰当报复引发了“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那可能是更大的一场灾难——对受打击者、对美国，甚至对许多无辜的国家和百姓，都是如此。

#### 五

在实施大规模报复行动方面，美国亦有它的难题，这些难题不单美国独有，多半也为世界上其他受到恐怖主义困扰、希望采用“外科手术打击”消除之的国家所共有：首先，恐怖主义势力分散藏匿于人群之中，其基地往往散建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落后国家，军队可能难于精确打击；这中间最大的困扰是，美国如果不运用地面部队，单靠空中打击和经济封锁等方式，可能像对待萨达姆的伊拉克一样，无法达到精确打击、铲除根基的目标；一旦动用陆军，尤其是大规模调动地面部队实施攻击，又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甚至陷入泥潭难以自拔，后者可以说是美国战略家最害怕见到、美国公众最不愿意支持的一件事。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就饱尝了这类苦头。其次，美军以往的作战计划及训练（包括后勤保障），主要着眼于国家间战争，美国人最擅长的是“沙漠风暴”那种闪电式战役，现在突然调整打击目标，要寻找的是“蒙面敌人”，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因此势必会有一系列的不适应现象出现。这好比是“拿高射炮射蚊子”，劳而无功或事倍功半。再次，报复行动如果打击过大，伤及太多的无辜百姓和民用设施，不仅将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新的抗议，也会让美国国内民众对政府方针的支持率下降。同时，显而易见，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对美国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便是西欧、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盟友的帮助也不会是无限度的。可以肯定，美国的报复行动越长，造成的无辜伤亡越多，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支持就越少，要求美国保持克制态度的声浪就越高。最后一点是，对阿富汗和中东等地区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支持的反美恐怖主义势力（如本·拉登和“哈马斯”集团）实施的大规模攻击，可能使中亚地区的地缘安全格局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微妙转变，最终将引起这一地区有关大国的反弹。还在美国实施报复行动之前，俄国

军方和战略学界已有多次警告,在处理本·拉登等中亚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问题上,美国应当在实施精确报复性打击之后迅即罢手,不要企图借机在中亚地区这个属于前苏联的战略疆域打入一个楔子,否则,俄罗斯是会作出“适当反应”的。

## 六

很多人指出,“9·11事件”是继“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在本土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论。我个人相信,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之前的“珍珠港事件”一样,“9·11事件”将被确认为一个历史的分界线。它带来的长期综合症,将导致美国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改变,很可能伴随有持续的大讨论与新的战略学说产生。实际上,从90年代初起,随着苏联的解体 and 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大获全胜,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世界格局及美国地位的争论,形成了众多的见解和流派。比如,老布什总统曾提出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强调冷战后的秩序将由美国一家主宰(“领导”);美国国务院的谋士福山随即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其他力量挑战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已经结束;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则宣扬“文明冲突论”,强调各种文化、种族、民族矛盾在决定世界前途方面的优先重要性;更多的西方学者讨论了“民主和平论”,以为欧美的价值和体制可以给充满紧张对峙的世界带来福音。诸如此类,难于在这里一一列举。就我看,冷战结束后没有哪次讨论和观点会像这次一样深入持久和刻骨铭心,因为前者是美国人在欢庆胜利的氛围下展开的议论,现在刚好相反,美国人是在痛苦中反思。也许,后一种学习方式更有助于美国正确认识自身的安危,更有利于定位它在当代世界的角色。显而易见,新的大讨论将涉及广泛的领域,比如,人们已经在议论所谓“灰色战争”的概念,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关于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荒谬性,关于军事力量及情报机构的重新配置,关于金融、投资、证券、保险、外贸、传媒等重要行业在恐怖主义袭击下生存能力的评估,关于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危机处理和应变能力,关于大国关系和国际合作的新形式,等等。同理,肇始于美国的这场思想碰撞,将激发其他国家战略学界的回应,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一波的国家谋略之论争。我们许多人都将成为这一轮反思过程的见证者。

## 七

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同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分析及预测。其中之一是,由于美国国内安全感下降,将会导致一系列不利于美国的消极后果,比如,美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减少,美元汇率长期动荡不定,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外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和美国对外经贸关系将因此受到连累,加上油价上涨等因素的作用,进而使美国已陷入衰退的经济更加乏力,乃至形成一种长期的低迷态势,逐渐影响美国的超强地位。与之对立的见解是,美国经济固然在短期内遭受到沉重打击,但从中长期角度综合考虑,美国国内的结构和体制没有变化,美国力量赖以支撑的那些基本面仍在起作用,尤其是从历史经验看,美国人越是遇到危机就越是“亢奋”,越是有外部敌人就越是内部团结,美国行政当局获得的支持也越大、效能也越高,因而美国不仅很快会渡过难关,而且有可能使整个经济、军力及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持后一种见解的人还举出美国经历的数次“战争景气”(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前后,美国都出现了后来所说的“战争景气”),佐证此言不虚。另有一种看法认为,“9·11事件”将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有利于外来移民的宽容气氛逐渐弱化,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和排外情绪将会上涨,甚至导致美国传统的多元民主体制被“白人至上主义”所削弱。抱有这种认识的人,提到了二战前夕“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的排外浪潮和日裔美国公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当然,也有不少对此不以为然的说法,它们的基本论点是,今天的美国早已不同于往昔的美国,民众的认识和体制的约束使得“麦卡锡主义”不可能死灰复燃,更何况美国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目前对此已经有所防范和提醒。事态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现在或许无人说得明白。我认为,对上述事关大局却大相径庭的估测,既不可不听,又不可全信,需要的是长期跟踪研究和仔细全面分析。

## 八

目前看上去各国几乎众口一词谴责此次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但从利害关系和战略角度分析,许多国家其实盘算不一、喜忧各异,仔细听就知道调门有微妙

的差异。比如：以色列内心里可能万分窃喜，因为头号军事强国美国今后不仅将给予这个犹太国更多的支持，而且会更加不遗余力地直接参与打击“哈马斯”组织的行动，从而使中东地区的战略天平更加向以色列国倾斜。它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第二世界国家一起，组成了拥护美国的“强硬阵营”。巴勒斯坦人尽管暂时出了一口恶气，但阿拉法特十分清楚他今后的事业一定更加步履维艰，中东和谈的赌局将缺少“哈马斯”这类筹码。伊拉克、伊朗、利比亚、阿富汗等与美国有“冤结”的国家，也会面临类似的麻烦前景。这些伊斯兰国家加上阿拉伯地区的多数国家以及古巴、委内瑞拉等国一道，大体上构成“反对美国残酷战争行动的阵营”，对“文明冲突”的前景以及美国的意图怀有深深的疑虑与担忧。两种态度之间有大片的中间立场，利害关系更加微妙复杂。巴基斯坦可以说是在此问题上最为难的一个国家。它是世界上惟一与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政权保持外交关系的邻国，对这个伊斯兰教义受到高度尊重的国度，不可能完全跟在美国后面；但它又不能不顾及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何况穆沙拉夫将军需要国际大家庭承认他的合法性。他与中国、印度等大邻国的特殊关系，使得这个国家不得不极其谨慎地响应反恐怖主义的外部呼吁。日本和我国的台湾一定程度上也是（至少暂时是）输家，因为美国一段时期内将无暇优先考虑后者的所谓“安全需求”，而它们两家从来依赖大洋彼岸的“保护伞”。它们现在又不能对中亚、西亚国家过分强硬，因为它们的石油生命线严重依赖这一区域。密切观望、小心表态，可能是它们不得已的选择。安南秘书长可能会对国际社会新的合作气氛的出现、尤其是美国要迅速缴纳所欠会费的态度和它对安理会的需求感到满意。俄罗斯（国际上有人还加上中国）可能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它不仅看到美国人战略注意重心的转移，多少赢得了推迟美国战略力量破坏原有的美俄战略平衡的时间，而且获得了一个需要精密博弈的机会，即它既要美国适当参与、帮助它消除阿富汗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又要精心防范超级大国对中亚的军事介入成为新的心腹之患，避免“前门赶狼、后门进虎”。俄国战略大师们向来擅长此道，可谓“机遇大于挑战”。没有不变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国际关系中的这句至理名言再次得到充分验证。

## 九

从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的角度观察，“9·11事件”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第一，全球化时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危害，将由此而获得广泛认定。可以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恐怖主义像这次那样，能够在瞬间造成成千上万人的伤亡和几十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财产损失，警醒世人未来的“灰色战争”将有多么可怕和多么地出人意料，带来了国际社会如此坚定的反击意志和联合行动。第二，“9·11事件”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深刻认识到，不仅要对各种恐怖主义行为加以强烈谴责和予以坚决反击，更需要对恐怖主义赖以滋生和蔓延的根源深入挖掘。这方面，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提出，应当认真解决世界热点地区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矛盾，用新的思路和紧迫意识重新加以解决。人们也呼吁，应加紧在国际制度方面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规范与安排，比如帮助南方国家克服（至少是缓解）贫困、饥荒、难民、失学、债务、社会发展停滞以及在此状况下出现的无助无望情绪。说到底，没有这些努力，不光弱势的一方将陷于绝望，发达国家的安全最终也得不到保障，国际和平与发展的进程更将被逼入死角。第三，世界上很多人也许会有一个新的重大发现，那就是：美国以往那种我行我素、强权开道、蛮横打压的单边外交政策，会招致“损人不利己”的恶果；平等协商、认真对话、互谅互让、共同安全的思路与方式，才是国际安全的可靠保障，它常常比实力政策和“自助”方式更加利人利己。应当说，这正是中国等一些国家近年来倡导的“新安全观”的要义所在。我相信，在“9·11事件”之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将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内涵，并依此审视和调整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国也可能以此次事件为重大契机，推动和组织各国在特殊的对话框架内，探索新形势下国际安全合作的新方式，推进新世纪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

## 十

最后简单谈几句中国的应对之策。鉴于形势还在发展，这里只能有初步的判断与建议：首先，国际恐怖主义不仅是国际社会在新时期的大敌，也是我国的心腹大患之一，前两年在新疆和北京等地发生的爆炸事件已显露出它对我国边疆稳定与社会安定之大局的严

重危害。因此,中国不仅应当从人道主义角度对美国此次遭袭受到的大量人员伤亡表示同情,而且有理由真诚和坚决地响应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呼声。其次,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还是一个与穆斯林世界有着良好关系和密切利益的地区强国,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等中亚、西亚国家及相关势力的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时,我们应当审时度势、冷静观察,保持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密切联系和磋商,坚持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合法性旗帜下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抵制一切凌驾其上的图谋和做法。就是说,既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又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尽量避免损害我与穆斯林世界的良好传统关系,三位一体的任务不可分割或脱节。这方面,保持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协调一致是特别关键的,任何国家没有理由采取不加协商的重大单边行动。我认为,它是保障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架构实现整体性有效合作的枢纽。再次,我们应深刻总结“9·11事件”提供的国家安全启示,全面追踪各国和国际社会对此所得出的分析结论,同时认真查找我国国家安全存在的各种隐患,并根据国际战略新的形势及时制定或调整相关政策。我们的国家强力机器和研究部门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加快建立危机处理机制,未雨绸缪,早作预案。考虑到美国的反恐怖举动及其战略动向对我安全的特殊敏感性,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特别慎重地处理中美关系,凡涉及这方面的议题和事务,不论是台湾问题和军售问题,或是WTO问题和APEC问题,还是协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以及其他一切相关问题,都应在统一的决策框架下、按照预定的思路和办法、有条不紊地展开和收束,切忌贸然行动和“单兵突进”。总之,此次事态应对得当,不仅有助于改善中美两个重要大国的关系,也将有利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以及我在国际社会建立更加良好的形象。总之,中国有一切理由把握好“9·11综合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最后,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学术界加强对恐怖主义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性。前面已经分析过恐怖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大的危害,因而这里不必赘述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我在此要指出的是,研究恐怖主义概念并不容易,存在着众多的难点及复杂之处。单从概念上讲,究竟何为

“恐怖主义”?现在国内外说法不一、定义各异,但我认为所有现有定义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与缺失。比如,有的强调,恐怖主义的关键内涵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特殊反抗手段,或者说是非国家行为体对抗国家暴力机器的一种特殊行为。但它似乎完全排除了国家恐怖主义存在的可能,从历史上考察,它实际上也无法解释最早的恐怖主义形式——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当然,它实际上放过了一些国家纵容支持甚至直接参与的恐怖主义形态。照这种认识,国家可以胡作非为而不被视为恐怖主义。有的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战争方式,是超越常规形式、没有规律可循的打击。这种看法的弱点是,它没有确定恐怖主义的性质,仅仅从外表上勾勒了恐怖主义行为的某些特点,殊不知这些特点可能为其他非恐怖主义的作战形式所共有,比如未来的军事行动越来越有可能是以灰色战争方式或不对称方式出现的。有的定义把侧重点放在恐怖主义的政治目标上,指出它往往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和以制造大范围的恐慌为特征,但有哪一种大规模的暴力方式是没有政治目标的呢?否则就不会有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了。同理,制造恐慌亦不可看做恐怖主义所独有,国家的许多镇压方式尤其容易带来大面积的心理恐慌和社会紧张,但你不可以将后者简单说成是恐怖主义。也有的人看重恐怖主义的非理性、非人性,即它多半以攻击平民百姓为达到目的的主要方式,是对人类良知的挑战。这也是一个含糊不清、边界不明的定义,它既没有讲明谁是攻击的发动者,也没有告诉我们对军事设施的不宣而战,比如这次“9·11事件”里对五角大楼的袭击不算恐怖主义,以及美国军队对阿富汗民用设施的轰炸和对无辜百姓的大量伤害不算恐怖主义。即便我们将所有这些要素混杂在一起,也不一定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不一定能够适合新形势下国际斗争的需要。当我们国家的外交发言人反复宣示“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时,研究人员应该仔细考虑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可能挖掘出哪些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充分的学理依据,为我们国家更好地参与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以及在这一斗争中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9-20]

[修回日期:2001-09-24]

[责任编辑:邵峰]